

【哲学·政治学】

中产阶级话语的政治定位与思想引导

李风华¹, 张丹²

(1.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湖南 永州 425006)

[摘要] 中产焦虑已经构成当前大众话语中一个显著的存在,它表明,以小资产阶级精神为其实质的中产阶级话语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审美层次向社会生活扩展,它围绕着纵向阶层流动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影响远远超过该群体本身,已经构成一种重要的话语力量。从政治上看,中产阶级话语的存在具有长期性,其总体上是积极的,但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它属于人民话语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与工农群众的话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对话者和内容来源。针对中产阶级话语的思想引导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 中产阶级话语;小资产阶级;政治定位;思想引导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1)02-0030-10

曾几何时,中产焦虑已经成为大众媒体和自媒体所广泛传播的名词,它指涉子女教育、房价涨跌、医疗问题,到食品安全、空气污染等等一切普遍性社会问题对个人所造成的困扰。而将这种焦虑表达出来的文字则迅速在大众话语中流行。比如,《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孩子,我为什么宁可放弃五十万,也要逼你去读书》《月入3万也无法负担暑假补习》,等等,这些文章在网络论坛、微博、朋友圈盛传,评论很容易就是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近年来,也开始有学者关注这种现象,并试图解释这种焦虑的直接原因与心理机制,甚者将这种焦虑扩大化,喊出“中产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①总的来说,绝大多数文章的描述与解释或明或显地传达出这样一种心理图景:中产阶级本应当过着富足安稳的生活,但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与政治条件下,却不得不深深陷入各种焦虑之中。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中产焦虑背后所体现的话语值得重视。现有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尤其是英文文献,着重关注其对于民主化、法治等政治问题的当下态度,属于现象层面的观察与概括。^②然而,现有研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角度去把握和定位中产阶级及其话语,因此,其结论往往

[收稿日期] 2020-12-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人民内部矛盾视野中的新时代阶层问题研究”(19YJA710017);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课题“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与阶级阶层问题研究”(1718ZDAM06);湖南省统战部年度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课题《“中产焦虑”及统战对策研究》(2019005);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专项资金资助(19GG22)。

[作者简介] 李风华(1975—),男,湖南安仁人,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人物工作研究(湖南)基地研究员;张丹,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与主流政治话语存在着隔膜与疏离。作为大众话语范畴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其背后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判断或多或少隐含着某种政治倾向,并在一定程度上与理论话语形成共振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不仅仅包括理论话语,而且也应当将大众话语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重视以中产焦虑为代表的中产话语,适当针对这一话语进行价值引导,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任务。

一、“中产焦虑”背后的话语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看,上述文章所描述的焦虑图景只是就事论事,而未能上升到社会结构的层面来分析与解释。事实上,所谓中产焦虑,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看,中产阶级(或者译为“中间阶级”)并非一个特定的群体,它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指工商业者等资产阶级,而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则指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群体。^③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里,中产阶级的主体主要指小资产阶级,亦即拥有生产资料的独立劳动者,它通常指涉“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等职业群体,《共产党宣言》称之为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等级。尽管当代中产阶级主要指以白领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劳动者,但其基本命运和精神实质仍然应当划归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小资产阶级范畴之内。^④小资产阶级的“命运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一部分被资本集中所压垮,另一部分则将被无产阶级的胜利所摧毁。”^{[1]528}因此,他们希望能够爬上去,成为资产阶级,但大多数由于资本主义的深化而被抛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这种渴望发财而不得不接受沦落命运的处境,决定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突出特征是其心态上的焦虑。当代中国的中产焦虑在其具体的直接原因固然有时代性,但是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与忧虑感,却是一以贯之的,它指向的是中产群体试图实现阶级再生产的渴望与不安,是中产阶级话语在特定时期的突出表达。

中产阶级话语指本质上反映小资产阶级诉求与思想倾向、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反映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公务员等具有较高文化的职业群体的诉求与倾向的语言。改革开放以来,渴望发财的个人

① 有关中产焦虑的研究文献并不多,但已有少数敏锐的学者探讨该现象,比如李春玲的《中国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 and 焦虑心态》(《文化纵横》2016年第4期)、雷开春的《青年中产的焦虑:“被下流”的风险及其应对》(《青年学报》2018年第2期)。所引“中产的焦虑正是中国的焦虑”是秦旺在《决策探索》2010年第8期上的同名文章。

② 如,He Li,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and Its Implications”,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2006, Vol. 33, No. 2, pp. 67—83; Jie Chen and Chunlong Lu,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e Middle Class’s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11, Vol. 64, No. 3, pp. 705—719.

③ 宋丽丹指出,无论使用“中产阶级”,抑或“中间阶级”,其对应的英文都是“middle class”。“中间阶级”用以表达“居于中间的阶级”这一本意更为准确,而中文常见的“中产阶级”则增加了原文所不蕴含的“财产”之意。她还指出,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中间阶级的实质是小资产阶级。但由于莱特·米尔斯将中产阶级扩展至工薪专业工作者、管理者、办公室工作人员和销售人员。因此,流行的观念往往将中产阶级扩展至白领等各个职业。(参见宋丽丹:《“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当代西方社会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二章)。

④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小资产阶级的论述并非仅仅局限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其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理解一直在发展。《共产党宣言》里将小资产阶级指“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这是很典型的依据生产资料来界定小资产阶级。之后,恩格斯很快也将这个概念扩展至“律师、医生、教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7卷,第160页)。再后来,恩格斯在1865年的《普鲁军事问题与德国工人政党》一文还将“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也纳入了小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75页)。可见恩格斯的论述已经没有完全根据生产资料所有制了,社会经济地位也是一个差别阶级标准的重要考虑因素。列宁对小资产阶级的使用也有了新的扩展,比如他说过:“小资产阶级在工农业中‘受到压迫’的同时,还有一个如德国人所说的‘新的中间等级’,即小资产阶级的新阶层——知识分子在产生和发展。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也愈来愈困难了,他们大多数人是从小生产者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的。很自然,这必然会使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广为传播,经常复活。”(《列宁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88—189页)。可见,经典作家并没有拘泥于原有的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依据。至于毛泽东,则做了看似更为大胆但实则顺理成章的延伸,将小资产阶级延伸至职员、学生等。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样表述:“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小律师、小商人”这些基本上是独立执业,纳入进来没有问题。但是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这些人基本上不大可能独立执业,但毛泽东仍然将他们称之为小资产阶级,这些恰恰就是当代中产阶级所主要涵盖的主体。孙寿涛教授指出,中产阶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描述,而不是阶级结构的描述(孙寿涛:《中产阶级理论的破产与“美国梦”的破灭》,《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9期,第73页)。因此,有理由认为,中产阶级虽然顶着一个“阶级”的名义,但并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阶级,其精神实质是符合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倾向,中产阶级话语的实质是小资产阶级话语。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在论述中产阶级话语时,强调的是现象层面上的话语对象;而在论述实质,尤其是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时,则强调其“小资产阶级”的实质。

主义倾向日益流行,“小资”作为一个审美与生活情调的概念也开始进入到人们的话语空间,并构成一种重要的文学与社会现象。^[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利益分化的深化,中产阶级话语已经构成经济、社会与日常政治领域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甚至逐步成为一种主流的大众话语。当前,中产阶级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中产阶级话语中隐含的话语主体通常以知识劳动者身份出现。《共产党宣言》中的小资产阶级最初局限于小工业者、小店主、小商人。这是一个纯粹基于生产资料占有的经济描述,除了其劳动者身份外,同时也强调其拥有生产资料的属性。但这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话语权比较弱,恩格斯在总结 1848 年革命时注意到,代表小资产阶级而控制政治运动的是“律师、医生、个别商人和教员”^{[3]160}。律师、医生和教员,有的是以独立执业的形式营业的,因此其经济属性自然应当归于小资产阶级。但其中也有一部分属于资本家或者政府机构,因此其经济属性与小资产阶级存在一定距离。虽然如此,由于他们共同的职业以及类似的以知识作为其收入来源的特征,其思想倾向也与小资产阶级相同,因此也可以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畴。同样地,毛泽东也是将中小学教员、律师以及学生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4]5}经典作家的理论对于我们认识新时代的阶级阶层关系具有重要启示。表面上看,当代中产阶级话语的主体并不局限于个体工商业者这些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也将白领这个流行的职业群体纳入进来。而且话语具有延展性和传染性,以独立的个体形象出现的话语往往会引发相近群体的共鸣,甚至会导致一部分人对于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错误认知。比如,一些学者可能在小资产阶级话语以及西方理论的影响下,把自己想象成一位“独立知识分子”,并接受诸如国有资产私有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的主张。随着自媒体的迅速扩张,中产阶级话语的传播更为迅速和广泛,非本阶级的“受众”迅速“中产阶级”化。现实中随着民众收入地位普遍的改善,可能会出现客观所属阶级与主观阶级身份认同的不一致,亦即所谓社会身份认同的断裂。这在社会阶层流动加快的今天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会使得中产阶级话语主体有所增加,使得不拥有生产资料的大学生、白领等群体自发地接受并传播中产阶级话语。也就是说,中产阶级话语的传播者和受众已经不再仅局限于传统的小资产阶级本身,它所涵盖的阶层众多,在某种程度上,该话语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尤其是阶层问题上)的话语权带来了冲击。但是,从根本上讲,这种中产阶级的话语并未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实质地位以及历史命运。

第二,中产阶级话语最核心的主题是以阶级差距为中心母题的话题群,包括收入差距、个人奋斗、教育投资、房价等话题。中产阶级话语兴起的初期,主要围绕着消费和审美意义上的“小资情调”而展开。^①基于小资情调的话语也蕴含着某种程度的阶级歧视意味,但由于小资情调的流行范围相对较窄,其阶级差距意识尚不突出。近年来,以阶级差距为核心的许多话题直接切入更容易挑动民众神经的现象,各种攀比性的文章迅速流传,成为当前网络流行话语的突出现象。收入、教育、房价和医疗等话题之所以成为当前中产阶级话语中最流行的主题,一方面由于它涉及的民众面是最广的,另一方面也因为民众所感受到的经济与社会压力日益增大。对于收入的关注以及对于前途的担忧,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小资产阶级话语的一个普遍表现。早在 90 多年前,毛泽东就形象地概括出小资产阶级的特点:“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②。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军阀等剥削阶级的压迫,小资产阶级的处境日益艰难,因此他们对前途非常忧虑:

① 有作者甚至认为,消费是中国中产阶级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周晓虹:《再论中产阶级:理论、历史与类型学兼及一种全球化的视野》,《社会》2005 年第 4 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 页。按毛泽东该文中的“中产阶级”指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中产阶级截然不同。

“瞻念前途,不寒而栗”。当前的中国经济状态当然是百年前的旧中国所不可比拟的,但是两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相似地位决定了,中产阶级话语对于阶级差距这个话题的天然敏感以及个体命运的悲观。与整个国家形势的欣欣向荣相比,中产阶级话语的这种忧虑感显得格外突出。

第三,中产阶级话语是一种大众话语,其最主要的活跃领域是大众传媒,尤其是以自媒体和论坛为代表。中产阶级话语并不是一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话语,而是一种混杂了各种概念的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众话语,并且其在各个领域的分布强度也不尽相同。在经济领域,中产阶级的力量较为弱小,事实上经常处在受资本挤压的地步。在政治领域,中产阶级天生的动摇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文化领域则构成中产阶级话语天然的温床。“良好的教育和相近的文化趣味将在大众传媒产生同声相应的效果,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在这里发现彼此是同路人。他们自由地出入这个公共领域,并且在某种符号体系之下集合为一个共同体。”^[2]中产阶级话语之所以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流行的话语力量,这与市场经济尤其是网络时代中文化产品的传播逻辑有关。普通工农大众由于其购买力的限制,以及党媒和文化部门的引导,其主要参与的文化消费属于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着重于讴歌新时代,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文化产品。但中产阶级话语所面临的消费对象是有一定文化购买力的群体,其话语本来局限在一个相对较为狭窄的范围。但必须承认的是,中产阶级话语由于其言说主体具备相对较为深厚的知识储备,加上其巧妙的修辞策略,这种话语往往获得更为广泛的接受度。这突出表现在,中产阶级话语在青年大学生中的影响更大,而普通工农则处在一个相对失语的处境。中产阶级话语在文化领域获得了比其经济与社会实力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突出现象。

总之,当代中产阶级话语虽然其受众与所想象的主体是一个知识劳动者,但并不会改变其内在小资产阶级的实质。这种话语总体上处在大众话语,虽然并非一种严格的话语体系,但由于其超出通常的中产阶级主体的范围,从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构成了强烈的挑战。而在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5]196}中产阶级话语虽然并非与政治直接关联,但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着特定的政治—社会功能,从而影响政治与政府政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给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带来的挑战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潜在的危险。就像有作者指出的那般,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滞后于社会发展现实的需要,国内大众话语领域中出现了“失语”的困境。^[6]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的“失语”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中产阶级话语的过度泛滥,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话语进行准确的政治定位和正确的思想引导。

二、中产阶级话语的政治定位

准确而恰当的政治思想定位是对某种话语进行正确引导或者斗争的前提。立场根本错误的敌对思想,这是对敌斗争的内容,而立场仍然属于人民的范畴但存在着一些不正确或者不妥切地方的思想,则属于群众工作或统战工作的内容。我们认为,在中产阶级话语的政治定位上,应当从中国社会的历史阶段、民族的历史使命、人民立场以及话语发展规律这几个角度去把握它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判断。总体上来看,它属于思想政治工作和统战工作的范围。

第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来看,中产阶级话语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表达和价值诉求,它将会长期存在。中产焦虑实际上是松散的集合体——包含中小企业主、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各色人等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7]。不管这一松散的集合体中某一阶层的数量增多或减少,中产阶级这一松散的群体将会长期存在,这一群体因职业和地位危机感、家庭社会地位

的危机感所传递出来的中产焦虑也会长期存在。

中国社会地位竞争激烈,中产阶级向上流动的难度系数很高,而向下的风险却是不低,受经济危机或者疫情这样突发事件的影响,一旦失业,中产阶级的“好牌”就被洗掉,所以中产阶级极为焦虑和敏感,这种焦虑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房子”“孩子”的特殊关注上,房子是其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孩子承担着社会流动的代际期望。他们对涉及房产政策、教育公平和社会流动这样的议题非常敏感^[8],一向保守的他们在谈及这些问题上的话语略显激进,甚至会走上街头,比如用集体散步应对PX项目建设;集体抗议高考指标的缩减。从长远看,中产阶级话语具有合理性,它是处在一定社会结构的某一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在与中产阶级利益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上,他们的关注和发声,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舆论发酵,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但这种合理性并不意味着正确性,更不可因此而放弃对其价值引导的责任。这是由于在大众话语层面,中产阶级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尤其是在涉及到重大方向路线的选择时,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摇摆性往往会表现出来。列宁曾经批评他所处时代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只是讲讲这种好心的、无关痛痒的、空洞的大话,实际上却束手无策地跟着资产阶级跑,口头上在某些方面对无产阶级表示一点‘同情’,实际上却仍然依从资产阶级,不能理解或者不愿理解,只有走打碎资本主义枷锁的道路,才能使人类摆脱帝国主义。”^{[9]128}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网络上经常出现一些崇拜外国资本主义和妄自菲薄的言论。在中美贸易战的当下,我们也能经常听到类似的投降派的声音。可以说,中产阶级话语的附属性也决定了对其价值引导的必要性。

第二,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话语是一支总体上积极但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的重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小资产阶级有诸多批判,但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盟友,是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10]628}。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当坚持独立立场并且与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进行斗争。这一策略后来发展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以及与机会主义斗争的党建理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中,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包含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都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息息相关。只有国家繁荣富强,各种话语主体才能获得更多,因此各种话语主体——包括中产阶级话语主体在内——诚心诚意地追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目标。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11]30}。总体上来看,中产阶级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实现民族复兴这一根本性的历史使命上是一致的,中产阶级话语主体自始至终都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因此中产阶级话语在政治倾向上总体上是积极的,是欢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

但中产阶级话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作为话语主体的中产阶级欣喜地接受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升值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从现行体制的稳定中获取利益,所以他们不会有反体制的倾向。但是即便他们的收入高于所有人群中的中位数,达到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可遗憾的是,他们往往认为这种收益是对自身努力的回报,而且在阶层地位认同上不同于农民的向上偏移,他们更倾向于向下偏移,这种向下偏移的后果就会使得他们信任政府的可能性更低,认为社会公平的可能性更低^[12]。对于城市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不便和成本,他们非常反感,并往往以此指责政府不作为。他们为撤侨、体育健儿夺魁、科学成就等等的成就大声喝彩,同时又质疑相关支出是好大喜功,容易中饱私囊。他们要求政府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小政府,可遇到经济社会的不公平就责怪政府监管不到位,指责政府不作为。总的来说,中产阶级话语蕴含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事业的由衷期盼,对当前体制是大体支持的,也可以说是没有对立对抗性质的。但是他们却不太愿意

为此艰苦奋斗,期望坐享其成,并总是抱着怀疑他人的动机来看待各种事情。

第三,从人民立场来看,中产阶级也是人民当中的一份子,中产阶级话语属于人民话语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与工农群众的话语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11]317}中产阶级话语所反映的一部分人民群众的情感、爱恨、梦想以及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是真实的,它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生活的反映。中产阶级话语中对于发财的渴望、在消费上的攀比、由于教育问题以及阶层流动而引发的焦虑、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恨都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部分真实情形。人民群体中,其中也包含着非劳动群体,他们的利益与声音也值得重视。即使非劳动群体与劳动人民之间有利益矛盾,这本身也是一种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13]更何况,中产阶级主流群体仍然是劳动者,虽然其利益表达和话语与普通工人和农民存在着距离,但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中人民群众的声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等闲视之。

从人民整体来看,作为中产阶级话语主体的中产阶级包括中小企业主、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各色人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层,内部多有分化,较之工农,他们享有着较多的社会资源,接受过更好的教育,且数量和规模随社会发展而增加。因此中产阶级话语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更加敏感,对政策和热点事件都能有自己的看法,往往能够透过现象觉察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以2018年的疫苗事件为例,中产阶层为主要的发声者,他们推动议题从“疫苗事件”的严谨表述(毒疫苗和无效疫苗的争论)和监管问题转向腐败问题、市场准入问题、私有化“原罪”问题、问责官员晋升问题、新闻自由问题^[14]。中产阶级话语是能够在合法的范围内一针见血地剖析热点事件的,是具有较为强大的舆论引导力的。

同时也要看到,普通工农的话语才是人民话语中最重要的主体,中产阶级话语与普通工农话语既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重叠,但有时对于工农群众的呼声仍然存在着隔膜与疏离。部分中产阶级试图实现现有的阶级传承乃至上升,可能有意或无意漠视想要分享资源的工农群众呼声。中产阶级话语在某些关系阶层位置的事件上是具有排他性的,比如因教育政策的变化(师资轮换)影响了学区房的权益时,中产阶级往往对这种教育改进政策提出批评与反对,试图以此保证自己子女的教育资源,^[15]这种反对实际上是与工农利益和呼声相违背的。中产阶级往往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无法理解普通工农群体的呼声。比如,湖南湖北农村的人情费非常高,老百姓都受不了。由于村庄无法自我调节这种人情支出,因此当地乡镇政府主动介入,成立红白理事会,对于老百姓的人情消费进行规制。“很多外来的中产阶级看到这样的新闻会说,哎呀你这政府要不得,怎么能干预老百姓自己的生活呢?但其实本地人的反应都是特别欢迎这种干预,你不干预,大家还有意见。”^①这个事例很有代表性,工农群众不希望自身财产因人情消费而大量流失,欢迎政府对人情消费的干预;而中产阶级因其阶级位置,他们更倾向的是自由宽松的环境,对政府干预人情消费持不理解和不支持的态度,即便中产阶级话语有时把自己想象成普通的工农群众,但实际上这种基于知识劳动者的中产阶级话语与真正的劳动群众的话语有时背道而驰。

第四,从话语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中产阶级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对话者和内容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属于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应当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方针,通过鼓励自由发展和自由争论的话语对话和交流而获得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

① 佚名:《灰色,理解基层治理的另一个维度》, https://www.guancha.cn/society/2018_08_29_470094.shtml, 检索日期 2019 年 9 月 7 日。

会主义话语体系也不可能在真空无菌的环境下丰富和发展。许多错误或者存在问题的观点往往能够引发话语的生成、讨论与完善。改革开放以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中产阶级话语也逐渐形成一种重要的话语力量。但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去理解,中产阶级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对话者,它可以提供话语内容,反映公众舆论的要求,其合理诉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所吸收,其一些不合理或者不符合现实的诉求也构成后者反思的参照。中产阶级话语从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虽然在话题和内容上,中产阶级话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要看到,在价值观上,中产阶级话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冲突。中产阶级话语所蕴含的“金钱至上”“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做个精致的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一定程度上消蚀了人们艰苦奋斗的信心;中产阶级话语所宣扬的“攀比之风”往往造成了人们对工农群众的鄙视和对富豪生活的羡慕;中产阶级话语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对于“公平”“自由”的诉求,使得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国情,在网络和自媒体中散播各种误解乃至曲解党和政府方针路线的言辞;中产阶级话语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称羨,往往使得不少人误判世界基本形势,甚至在中外关系上丧失了正确立场。凡此种种,这也说明中产阶级话语的消极影响绝不可以低估。

从上述四个角度对中产阶级话语的思想定位可以看出,中产阶级话语在新时代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积极因素,任何忽视或者消灭这一话语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承认这一合理性和积极因素的同时,还要看到它的另一面——中产阶级话语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因此,针对中产阶级话语的思想引导,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也正是基于这一政治定位的理由,中产焦虑及其背后所反映的话语群体,应当构成统战的重要对象。

三、对中产阶级话语进行思想引导

由于社会利益的分化,中产阶级意识话语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限制和引导中产阶级话语的根本路径在于,经济上要着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经济与社会的机会分配要注重公平,使用分配和再分配手段避免贫富分化。同时,在政治上,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综合渠道也具有重要作用。^[16]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引导并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中产阶级话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消除和存在,因此针对它的消极影响,更有必要对中产阶级话语进行合理的限制和价值引导,以使得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中产阶级话语。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在“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创造性地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使意识形态领域第一次有了管根本、管长远的根本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对中产阶级话语进行思想引导,就要坚持这一根本制度。这就意味着在各种重大和热点问题上要及时亮出党和政府的鲜明立场,有效遏制中产阶级话语的泛滥,引导中产阶级话语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表达。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或者影响广泛的热点问题,是各种话语权争夺的制高点。在这些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体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许多所谓“吃瓜围观”的舆论消费者。过去,由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模糊处理和宽容风气,中产阶级话语乘势而上,许多网民对于党和政府持怀疑态度,日益助长了各种错误的言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

主义的大众化,就能够有效遏制和引导中产阶级话语,形成正确的舆论方向。比如,就历史虚无主义这一现象来说,当宣传部门把历史虚无主义的做法视为一种“言论自由”和“百家争鸣”的现象时,中产阶级话语以及各种完全错误的敌对势力言论便在网络上过度泛滥,使正确的观点难以传播。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部门和理论工作者对于各种历史虚无主义言论和做法及时亮剑,有效地遏制了各种错误言论日益高涨的势头。人民群众对此纷纷称快,网络舆论为之一清。与此同时,网络上许多本来属于中间摇摆的人,也开始反思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可以说,在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引导中产阶级话语,敢于对错误言论“亮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对中产阶级话语进行有效价值引导的基本方略。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宣传部门和报刊媒体属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第一线,但争夺话语权并不只是宣传部门和报刊媒体的使命,也不仅仅是理论工作者和大学等教育机构的使命,它还应当是全部党和政府机构的使命。习近平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会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争夺话语权的斗争意识,应当在全党范围内树立起来。而党的领导干部,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定要有抓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意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针对中产阶级话语,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勇于在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发声,及时引导社会舆论,有效遏制中产阶级话语的扩张势头。

第二,培育和发展能够充分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形成对自由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压倒性优势,最终感染和决定中产阶级话语的走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在思想理论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已经牢牢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但也要看到,在大众话语层面,这一任务仍然任重道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并不等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后者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属于普及性和多样性表达的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本身属于大众话语层次,它所针对主题与话语属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问题,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社会文化基础。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要通过吸收并转化中产阶级话语中的合理表达方式,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民族复兴的故事与精神。要知道,中产阶级话语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网络民间舆论的主流话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其话语的表达更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期待,更贴近群众的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除了理论严谨、逻辑严密的理论话语体系外,大众话语体系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大众话语体系既要接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同时还要从各种话语体系中汲取有益的养分,用以丰富和扩展自身。在激烈的话语竞争中,那些脱颖而出的中产阶级话语往往在表达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与优势。比如,近年来流行的自媒体的微叙事、娱乐性的叙事。因此,恰当吸收这些成功的中产阶级话语的表达方式,不仅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有益途径,也是引导社会舆论、掌握话语权的重要途径,进而以压倒性优势感染和决定中产阶级话语走向。

中产阶级话语的表达形式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需要警惕。一般来说,中产阶级话语往往更借重于能够直接满足人们欲望的方法来让受众获得满足感。比如,网络小说往往设想各种“爽文”来获得超高的点击量,它除了满足了读者的幻想之外并没有真正有益的知识与精神享受。而各类网文则抓住人们的“痛点”,挑拨人们对于收入差距的神经,从而获得了广泛的转发与打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引导中产阶级话语,既要努力实现表达方式上的通俗易懂和群众喜闻乐见,也要避免单纯地追求传播的广泛度而落入了恶劣庸俗的低级趣味之中。

第三,揭露中产阶级话语矛盾,巧用话语冲突,引导中产阶级话语进行自我“调整”。挖掘中产阶级话语内在矛盾,适当引导相互冲突和制衡的话语局面,实现中产阶级话语负面影响的对冲,通过话语发展过程中的辩证冲突实现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理解与接受。一般地说,在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中产阶级话语天然地以个人主义为导向,以党和政府作为或隐或显的批判对象。这是因为,中产阶级话语的主流范式是国家—社会的二元对立,在这种范式中,如果社会出现问题,那么根子就在党和政府。这种官民对立的思维既有数千年的思维传统的积淀,同时又迎合了中产阶级话语的社会观。要改变这种官民对立的话语模式,不能一律粗暴地对中产阶级话语进行外部批判,而应当挖掘该话语的内在冲突。因为中产阶级内部本身也存在多种声音,其对民族复兴的渴望与对个人利益的诉求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张力。比如,一些人极端向往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社会生活,由此而引发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鄙夷和贬低。但同时,在中产阶级话语内部也存在着一种回归传统儒家伦理的人文诉求。这两者在传统文化和习俗方面的冲突构成当代人文话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话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当代学者对于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存在争论,这也说明了,中产阶级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只有一种声音,其话语的内在冲突是其固有的特征。^① 揭露其话语内部的矛盾,既可以降低人们对其的信服度,又能够在冲突中对中产阶级话语进行引导,从而促进话语做自我“调整”。

促进中产阶级话语的内部对冲本身就是“双百”方针在话语冲突方面的具体体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17]344} 中产阶级话语所关注的主题大抵属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往往会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与看法。除了导向明显错误和故意歪曲事实的说法,让不同的观点与看法之间碰撞,这既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体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教育人民群众,逐渐增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第四,积极挖掘和培养一批真学真信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自干五”,打造一支网络话语空间中的正能量队伍,以群众中的正能量引导中产阶级话语。中产阶级话语属于群众话语的“自干五”是“自带干粮的五毛党”的简称,是一批自发在网络舆论上维护民族复兴和国家发展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网民。他们具有平民化、大众化的特征,其语言接地气,在立场和情感上坚持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网络舆论阵地上自觉承担起肯定中国成就、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使命,引导中产阶级话语正确认识和评价党和国家。虽然“自干五”的话语并不纯粹,有些表述也难免错误,但其基本立场是正确的,其勇于与错误言论斗争的勇气难能可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发实践。^[18] 在“自干五”的影响力方面,一些网络论坛或者自媒体逐渐成为一个个积聚人心、传播正确观念、提高政治认同的重要阵地。与正式的宣传工作队和理论工作队相比,“自干五”可谓是一支支地方游击武装,其理论和知识水平虽然与意识形态阵地上的“正规军”存在距离,但由于其话语天然地接近群众,在影响群众方面,却有着后者所没有的优势。

但也要看到,“自干五”的来源比较复杂,许多“自干五”的话语本身也未摆脱中产阶级话语的局限性。一些“自干五”在肯定中国成就、宣传民族复兴方面能够顺应舆论潮流,为正能量的扩大起一定推动作用,但在各种质疑党和政府的错误言论流行时,却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不敢发声,甚至为错误言论推波助澜。这说明,“自干五”虽然在发挥正能量、引导舆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也导致许多“自干五”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因此,在肯定“自

^① 对于中国新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社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尝试测量出准确的社会政治态度(李春玲:《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 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社会》2011年第2期),认为总体上是一种社会稳定力量。但这样的总体倾向描述对我们认识中产阶级话语虽然有一定帮助,但往往遮盖其内部的多种声音之间的冲突。

干五”的同时,更要加强培训,鼓励其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话语的创造者。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南帆. 小资产阶级:压抑、膨胀和分裂[J]. 文艺理论研究,2006(5):2—12.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 [6] 曾令辉,陈敏.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主导权建设[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4):9—10.
- [7] 熊易寒. 精细分层社会与中产焦虑症[J]. 文化纵横,2020(05):112—120.
- [8] 熊易寒. 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及其对舆情的影响[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5):158—161.
- [9] 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2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2] 张海东,刘晓瞳. 我国居民阶层地位认同偏移对社会政治态度的影响——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9):80—94.
- [13] 李风华,谢华.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大理论创新[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06):121—128.
- [14] 熊易寒. 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及其对舆情的影响[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3(05):158—161.
- [15] 刘硕,周可阳. 学区房消费与新中产阶层的内部分化——基于绍兴市新中产阶层的访谈研究[J]. 社会发展研究,2019(04):76—95.
- [16] 沙莎. 中产阶层亚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影响及其路径重构[J]. 社会主义研究,2017(05):67—72.
- [17] 毛泽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8] 李风华,赵会龙. “自干五”:意义空间与统战路径[J]. 云梦学刊,2015(04):74—78.

(责任编辑:闫卫平)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Ideological Guidance of Middle-Class Discourse

LI Feng-hua¹, ZHANG Dan²

(1.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2. Yongzhou Teachers College, Yongzhou 425006)

Abstract: Middle-class anxiety has become a prominent presence in current popular discourse, which shows that the middle class discours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petty Bourgeoisie, has expanded from the 1990s aesthetic discourse level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level. It revolves around the core theme of vertical class mobility. Its influence goes far beyond the group itself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scourse force. From the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the existence of the middle class discourse has a long-term nature, which is generally positive, but also has negative impacts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eople's discourse group, but it is still separated from the discourse of the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interlocutor and source of conten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socialist mass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ideology to guide the middle class discourse.

Key words: middle class discourse; the petty Bourgeoisie; political orientation; ideological guidance